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总顾问:成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黄文夫 赵红 李千 吴明伏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主编:管益忻

副主编:启文 白卫星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圆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第 37 期 (总第 139 期) 2013 年 12 月 7 日 星期六 癸巳年十一月初五 投稿邮箱:jixjb@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135959 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有效市场也需有为政府

在本文中,林毅夫教授回顾了历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市场”的定位描述,认为市场作用从过去的“基础性”到今天的“决定性”的转变,意义重大。他重新解析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呼吁将“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结合。林毅夫同时强调需要消除对市场遗留的干预和扭曲,让资源由市场进行配置,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在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稳定、克服市场失灵上发挥作用,推动技术、产业、技术、制度等结构的变迁。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不断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强调物质利益在调动工人农民积极性上的重要性,但是仍沿着计划经济的思路用政府的力量来调整农轻重比例;后来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但是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 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当时的定位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只是几个字的转换,不过这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为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经济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制度基础。

中等收入陷阱 多源于政府市场关系失位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再次强调“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论断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从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风险和成本比发达国家低很多,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数倍

于发达国家。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年均增长 3%。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善于利用后发优势,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 8—10%。

可是从经验事实来看,从二战后到现在,全世界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然后进入到高收入(我国台湾省与韩国);只有 13 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其中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是西欧周边和发达国家原本差距不大的欧洲国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二战后的发展思路的主流是第一版的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也就是高度强调政府在资源动员和配置上的作用,忽视了市场。结果以对市场的各种扭曲建立起来了一些先进的产业,但是,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盛行,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学的第二版——新自由主义盛行,强调市场,忽视了政府的作用,主张采用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结果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经济普遍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

在同一时期,有少数经济体取得了成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既有“有效的市场”,也有“有为的政府”。为什么有效的市场很重要?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一个国家在国内、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的前提。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只有在充分竞争、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下形成的价格信号,才能使企业家按照当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产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国家具有竞争优势。为什么有为的政府也同样重要?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随着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安排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的完善不是一个企业家单独能推动的,必须要由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组织协调相关企业的投资或由政府自己提供这方面的完善。另外政府还需补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先行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样技术和产业才能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不断顺利地进行创新和升级。所以,



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必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再加上一个有为的政府。

对于转型国家,有为的政府尤其重要。一方面,转型国家因为过去所采取的战略,遗留了一批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对这些企业的保护补贴不能一下完全取消,否则会带来大规模破产、失业,造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需要政府给予原有的产业一些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转型中国家由于过去政府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基础设施非常差,同时存在很多制度扭曲,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务实地创造条件逐一去克服。

渐进双轨制的代价与纠正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的是一种渐进的双轨制,即一方面对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给予必要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让市场发挥作用。这样一个转型方式使得我们能够维持稳定和快速的发展,但是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最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断恶化,腐败现象越来越普遍。其原因在于为了保护、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业,我们保留了一些对价格信号的扭曲,比如通过金融抑制人为压低资金价格,将金融资源主要分配给国有和少数非国有大型企业。这相当于给大型国有企业和这些比较富裕的群体提供了补贴,而补贴这些大企业的是把钱存入金融体系,得不到金融服务而且相对比较穷的中小企业、农户和一般家庭。对于能拿到资金的企业来说,因为资金价格相对便宜,所以投资的是资本相当密集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少,从而也会抑制劳动需求和工资,进一步恶化收入

分配。此外,资源价格也偏低,谁能拿到资源开采权谁就能马上致富。这些扭曲都创造了租金,有了租金就有了寻租的行为,导致腐败贪污。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资本十分匮乏。当时以对市场的干预、扭曲给这些资本密集型大型企业保留一些保护、补贴是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必要,属于“雪中送炭”。经过 34 年高速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那么短缺,很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在这种状况下,继续保留那些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为了“锦上添花”,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蔓延。

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时俱进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需要消除对市场所遗留的一些干预、扭曲,让资源由市场进行配置,这样一方面能够让经济更好地按比较优势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遗留的社会、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应该发挥好的作用,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稳定,克服市场失灵,因势利导地推动技术、产业、技术、制度等结构的变迁。

如果能这样做,中国经济还可以持续、稳定、健康而且比较快速地发展,到 2020 年左右人均收入在 2010 年的水平上翻一番,加上人民币升值很可能可以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达到人均收入 12700 美元,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迈出坚强的历史性一步。

(转自 FT 中文网)

外眼看中国

中国城市困局

伊莎贝尔·希尔顿 环境网站“中外对话”首席执行官及总编

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高速城镇化之后,中国城镇的正式和非正式居民总数一举超越了农村人口数量。过去三十年中,超过 4 亿人迁入城市,2011 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 50%。如今超过 52%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 2015 年这一比例预计将达到 70%,这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 12 年城镇将迎来 2.5 亿新增人口。

中国的城镇化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社会运动,它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给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带来了诸多的挑战,由此产生的许多问题都与资金有关。户口是当前中国面临的历史遗留问题之一,这个人手一份的身份证明决定了中国人的居住地。在毛泽东时代,户籍制度使得农民被土地绑住腿脚。然而,过去几十年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工程建设红火时期尤其为甚。但如果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成了弱势群体,虽然可以在城市工作,却不能享受与城里人同等的医疗、教育等福利。

户籍制度以极低的附带成本为城市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但也被普遍认为不公平,亟需改革。现行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生活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往往不得不撇下父母子女,只身进城赚取高于农业收成的收入。如果希望下一代城市居民成为新的消费者,带动中国经济挺进下一阶段的发展,那么他们就应当享受同等的权益。但问题是,谁来推动这一改革?

中国大多数的地方城镇税收不足,几十年来财政主要依靠征用农业土地用作工业、商业和住宅的开发。这让许多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想要进一步的推进城镇化,地方政府的财政制度就必须进行改革。

现行财政制度的问题不止于此:它吞噬良田建起城市,但与此同时,城镇的扩张加剧了居民对私家车和公共交通的依赖,上班族不得不长途通勤,进而导致了碳排放量的攀升,并带来了令人窒息的空气污染和严重的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城市必要的基础设施则时被忽略,例如许多大城市在排水系统等方面仍存有隐患,造成它们无力应对未来的扩张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面对 2025 年恐将新增的 2.5 亿城镇人口,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中国要建造怎样的城市来容纳这些新城市人?新建十个 2500 万人的城市?三个 7000 万人的大城市?还是一百个 250 万人的小城市?这些新城市人将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将以何为生?他们每天要通勤多长的距离?他们能否住进高能效的房子?他们能否享受到城市生活所需的充足水源?他们产生的垃圾又能否得到回收利用?

中国未来城市的设计将不仅影响到中国城镇居民的健康和福祉,还将影响到中国对不断飙升的碳排放的控制,这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如果要成为“十二五”规划中描述的那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家,那么决策者们应该更多地学习哥本哈根这样先进城市的经验,而不是效仿洛杉矶那种已经过时了的样板。

如果中国真的实现了城镇化目标,那么 12 年后的中国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的变革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城镇化将是一场长期的社会和经济转型。过去五年中,中国的城镇中产阶级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发出他们的声音;他们希望自己的产权得到保护,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一个压力更小、环境更好的社会中成长。

他们要求清洁的空气和安全的水源,要求免受有毒化工厂的侵害。这些诉求已经超越了某个特定议题的本身,他们抱怨政府的不作为、透明度的缺失,他们要求在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和规划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克强总理将城镇化摆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建立可持续小康社会的核心地位。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产阶级城市居民将向拥有更高价值的工作岗位转移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消费者,他们也会要求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中国规划者今天的决策将决定这些美好的愿景能否得以实现。

(转自 FT 中文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理论研讨会暨《发展和改革蓝皮书》(No.6)首发式在京举行



本报讯 近日,由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经济学家周报》主办,威海茂达投资有限公司承办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理论研讨会暨《发展和改革蓝皮书》(No.6)首发式”在中央财经大学学术会堂隆重举行。北京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保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成勋、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经济学家周报》主编管益忻、国家能源局法制和体制改革司司长王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国家工商总局行政学院副院长李德伟、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院长曹元、《中国经济时报》社长许宝健、《发展和改革蓝皮书》副主编欧阳日辉等领导 & 专家学者参会并先

后发言。会议由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李涛教授主持。

纵观党的历史,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承担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和原则。为了总结我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所取得的成就,深入领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探索我国应如何全面深化改革,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学家周报》成功举办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理论研讨会暨《发展和改革蓝皮书》No.6 首发式”。

会议分成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发展和改革蓝皮书(No.6):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年(2003~2013)》首发式。会议首先由中央财经大学李俊生副校长致辞。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该书主编邹东涛教授作主题报告。

《发展和改革蓝皮书(No.6):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年(2003~2013)》对行政性垄断与“玻璃门”,宏观调控体系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农村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与制度创新,政府职能与经济发展方式“两个转变”,土地财政、政府债务与政府投融资体制,利率市场化改革与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税制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与要素市场改革,“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的体制困境,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食品安全体系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经验总结,深层次地探究存在的问题,前瞻性地提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建议。

第二单元:与会专家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税制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等全面深化改革理论问题展开深入讨论。经过讨论,专家们一致认为,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力争在 2020 年建成较为完

善、趋于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中国梦。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聚集一批杰出中青年经济学者、管理学者和学者型官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科学严谨的学风和求真务实的精神,以研究中国发展和改革为主题,努力构建一个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理论创新平台。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自 2008 年开始编写《发展和改革蓝皮书》,已陆续推出《发展和改革蓝皮书 No.1: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1978~2008)》、《发展和改革蓝皮书 No.2: 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1949~2009)》、《发展和改革蓝皮书 No.3: 金融危机考验中国模式(2008~2010)》、《发展和改革蓝皮书 No.4: 中共 90 年:经济建设之路与大国治理之道(1921~2011)》、《发展和改革蓝皮书 No.5: 以人为本: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10 年(2002~2012)》、《发展和改革蓝皮书》已形成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的品牌图书。

(启文)

本报将举办“2013 中国经济学人”评选活动

为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本报拟举办“2013·中国经济学人”评选活动。参评者应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其理论具有原创性、实战性、时效性、前瞻性和首发性;在本报至少发表过一篇论文;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欢迎具备条件者踴

跃参评。新送参评(参考)作品请发至本报投稿邮箱,来稿请注明“参评参考作品”。邮寄作品请寄至: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46 号东区一号楼 113 室,邮编 100081。参评稿收稿截止日期(以发送日期和邮戳日期为准):2013 年 12 月 31 日。